

# 近代中国知识妇女与辛亥革命

赵文静

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有着它特定的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以秋瑾、何香凝、徐宗汉、张竹君、尹氏姐妹等为代表的一批女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所显示的力量,所做出的贡献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举世瞩目。她们的行动,不仅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史。

## 一、近代知识妇女群的形成

辛亥革命时期女知识分子的崛起,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社会变革需要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而知识分子也只有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才能显示它自身的价值。女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来,正是适应了中国近代化这一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女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女学的兴起有直接的联系。中国近代的女子学校,最早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宗教而办的教会学校。1844年英国一妇女组织,趁五口通商开放之际,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是中国境内女学之开端。1847年到1860年间,外国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创办教会学校十几处。教会学校虽然是外国侵略者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客观上却开创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先河,并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师资。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从强国保种出发,为培养有知识的贤妻良母而倡办女学校。1896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开办了经正女学,1900年广州女医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育贤女校。除此之外,还有上海务本女校、爱国女校,在北京、天津、南京、长沙、济南、杭州皆有女校出现。从经正女学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兴办女学,成为当时一种时尚的事业。女学的出现,女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使妇女的精神面貌有了大的改观。她们有机会接触到近代的科学和文明,她们在课余参加远足、演说,甚至开运动会,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饱受封建专制之苦的中国妇女开始有了新生,中国妇女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蓬勃兴起。清政府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梦想抵制行将来临的民主革命高潮,宣布实行“新政”。其间,清政府把兴学堂、奖游学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由此中国迅速形成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各类学校在校人数达150万<sup>①</sup>,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约万人,女学生约百人。女子留学的兴起,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有了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成为中国妇女中最先觉悟的群体。它的崛起也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形成高潮的鲜明标志。

二十世纪初期,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这些热血青年很快摆脱维新思想,日趋革命化。女学生也开始办杂志、组团体,很快走向革命运动。孙中山提出的“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其中“创立民国”的核心是否定封建地主阶级的君权，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权，这从根本上与妇女解放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推翻封建满清皇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既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目标，也是广大妇女要求自身解放的迫切要求，从而在更广大的范围和更大的规模上把众多的女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行列中来，使近代妇女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这其中涌现出一批觉悟了的知识妇女，象秋瑾、何香凝、徐宗汉、张竹君、陈撷芬、林宗素等，她们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成为辛亥革命中的女英雄。

秋瑾，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就受到“三从四德”等诸多封建清规戒律的管束，封建制度对女子的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常常使秋瑾不堪忍受，她憎恨、咒骂“幽禁闺中的囚犯”生活。秋瑾幼年喜欢读历史传奇小说，中国历史上众多女英雄的业迹，常常震撼着她，使她产生了“天生男女原无别，岂独男儿气概雄”的思想，她向封建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1904年夏天，秋瑾终于冲破家庭的阻力，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毅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秋瑾广泛结交革命同志，参加爱国革命组织，投身到反清爱国的斗争中去。

何香凝，原籍广东南海县，出于香港一个商人家庭。她生来就有一种男孩子般的好胜性格，她喜欢听太平天国女兵的故事，反对母亲给她缠足，她有一双天足，因此这也成为与廖仲恺结婚的一个条件。婚后为资助廖仲恺留学日本，何香凝把陪嫁的珠玉首饰和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凑了一千多元，作为廖仲恺出国的旅费和留学费用。1902年冬天何香凝也东渡来到日本，并与廖仲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他们的住所也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络和聚会的场所。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何香凝成为最早入会人之一。

张竹君，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之家。青年时考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后曾在广州、上海两处行医。她不仅医术好，而且爱护病人，对社会工作也十分热心。她设立过女子学校、演讲会，提倡新知识、新道德，改良社会。张竹君的装束十分特别，她常身穿西装，脚穿男式皮鞋，两耳不戴耳坠，这种装束，在当时，引来了思想顽固者对她的讽刺，说她是“男儿婆”、“女界的梁启超”。武昌起义后，张竹君在上海邀集中西人士，组织红十字救护队分赴汉口、镇江前线进行战地救护。武昌起义之时，黄兴正在上海，是张竹君机智地掩护黄兴等从上海到汉口转往武昌指挥作战。

徐宗汉，广东香山人，出生于茶商家庭。徐宗汉为人豪爽，她曾协助张竹君在广州办过医院和女学校。1907年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听到革命志士的宣传，热烈赞成，遂后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徐宗汉在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机关、进行联络，为武装起义运送弹药。黄花岗起义前，徐宗汉积极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冒着危险，运送枪支弹药从香港回广州，并负责发放。由于寡不敌众，黄花岗起义失败，徐宗汉掩护受伤的黄兴来到香港，这之后，与黄兴结成革命伴侣，一直跟随黄兴从事革命活动。

特殊的历史背景，为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妇女群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知识妇女本身的觉悟，对旧的封建传统的叛逆，是她们能够成为辛亥革命中一支特殊力量的内在因素。

## 二、知识妇女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数量众多的知识妇女，吸引到革命行列中来。辛亥革命前后，她们以各种方式，参加这场革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创办女子报纸，宣传妇女解放思想。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女学生不断增加，她们深受日本当时正在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影响，迫切要求把这种新风移植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国外，以东京为主；在国内，以上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积极行动起来，开始筹办报章杂志。1902年《苏报》主编陈范之女陈撷芬主办《女苏报》分别在上海和东京出版。接着，《中国新女界杂志》、《女报》、《中国妇人会小杂志》、《女学生》等先后在上海、北京、东京出版。这里以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和后由秋瑾的学生创办的《神州女报》尤为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为筹资办报，不惜典当变卖自己的首饰、家什。

从这些报纸的内容上来看，既广泛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社会思潮，包括以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独立为主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又突出地宣传了反对封建主义、要求妇女解放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这些女子报刊的政治性很强，直接为辛亥革命做了宣传工作。这些由女子自己创办的报章杂志，表现了妇女本身极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2. 组织妇女团体，参加革命活动。

据现有资料统计，辛亥革命前后，由女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各种团体约有三十多个。这些妇女团体许多是应革命的需要而产生，政治色彩很浓。如1903年4月由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的“共爱会”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其宗旨是为拯救二万万女同胞。此外，还有“实行共爱会”、“女子雄辩学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子参政会”等。这些妇女团体积极投身爱国革命运动中。1901—1905年在拒俄运动中，东京的“共爱会”动员留日女学生参加拒俄义勇军，奔赴东北前线，当时报告参加的有林宗素、王莲、曹汝锦等留日女学生十二人。1905年5月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拒法运动，上海务本女校学生发表演讲，一致主张不购美货。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许多先进的知识妇女直接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支特殊的力量。何香凝是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秋瑾入同盟会后被推举为浙江省的主盟人。

除了组织政治性较强的妇女团体之外，一些以组织妇女学习手艺、自谋职业的妇女团体也纷纷出现。1904年张竹君在上海设“女子手工传习所”以传授手工技艺，解决妇女谋职为宗旨，以求妇女经济上独立。

### 3. 积极创办新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

辛亥革命前后，一大批爱国女知识分子，创办和参与创办三十多所进步的、重视革命思想教育的新式女学校。当时，浙江一省竟有六个镇、县、市有女子学校出现。这些女子学校，一方面向学生宣传男女平等，学习生产技术，取得谋生本领，另外，还对学生进行革命反满教育，进行军事训练，为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准备。这些学校还利用它方便的条件进行革命活动，成为接待联络革命志士的秘密机关。

4. 武昌起义期间,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成为其中一支特殊的力量。知识妇女参加全国的武装起义,分为两个部分,激进的一派多组织军事团体,参加军事行动。她们组织了女子军队,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在湖南、广西、广东、浙江、安徽、上海等地举行的武装起义。尹锐志、尹维俊姐妹组织的浙江女子军;广州军政府组织的“广东女子北伐军”,另外还有“女子军事团”、“女子决死队”等。妇女中的温和派,则积极投入红十字会参加前线救护和后方募捐活动。张竹君,在武昌起义后,即在上海组织赤十字会,奔赴汉口、汉阳前线,继又组织力量开赴镇江、南京,先后护救战士千余人之多。同时,上海还出现“女子后援队”、“女子北伐救济队”等战地救护组织。上海的女子协赞会进行劝募助饷活动,曾募得两万多元,支援当时的战事。

#### 5. 发起女子参政活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妇女活动转向了女子参政。原有的军事、救护等妇女团体,改组为要求女子参政的组织。1911年11月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素在上海发起“女子参政同志会”,其宗旨为“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sup>②</sup>。林宗素还拜访孙中山,提出参政的要求。“女子参政同志会”一再上书参政院,要求于决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注意女子的权利。后来又成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在上海、长沙、武昌、苏州等地成立分会,其声势非常浩大。

辛亥革命前后,广大知识妇女,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场民主革命,并凭借自身的便利条件,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她们的行动把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 三、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的特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进步的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国家遭受凌辱和贫困落后的境地,因而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第二,他们客观地感到,正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中国,清朝统治者已穷途末路,风云一时的维新变法也无济于事,因而开始向西方追求救国真理。他们敏锐地吸收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形成一种全新的理想、人生价值,并进行广泛的传播。第三,他们追求真理,具有为此献身的精神,当革命高潮来临时,他们能够站在前边,发挥着先锋和桥梁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妇女,除了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外,还带有她们自身的特点,第一,她们是妇女,亲身经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她们办的报纸,进行的宣传更能体现妇女解放的要求。第二,她们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热烈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的理想,要求婚姻自由,实现男女平等。她们大多背叛旧式家庭和包办婚姻,进行所谓“家庭革命”。她们的行动在当时广大妇女中起了表率作用。第三,她们的性格刚柔相济,英勇果断,又不乏女性的细致耐心,她们常常利用女性这种便利的身份,在革命中做秘密联络和掩护工作,以及教育、医务等工作,成为革命运动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特殊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妇女,在二十世纪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很活跃的角色,显示了中国妇女的觉醒和力量,这不仅在辛亥革命史上,而且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功绩不可磨灭。

由知识妇女为先锋而掀起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地位应得到历史的肯定和社会的承认。

列宁曾经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sup>③</sup>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过去，离不开妇女，人类社会的未来也离不开妇女，无论是过去历史上的近代化，还是现在进行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广大妇女的参与，不重视，不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都是实现不了的。

①陈育之《中国教育史》第620页。

②《女子参政同盟会草章》《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0页。

③《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责任编辑 董剑平)

---

(上接第18页)

族融合的方式不尽一致，所以，这一民族融合产生的不是一个新的民族，而是产生了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韩等几个新民族。因此，秽貊一词也就成为这几个新兴民族的族系名称。

《管子·小匡》：“禽狄主，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释名·释饮食》：“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太平御览·饮食·羌煮》：“羌煮，貊炙，翟之食也。”都可以证明原来貉系各族都是从事畜牧业的。而东北秽貊族系的各族却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由此可知，在秽与貉的融合中，较多地保留着秽系民族的风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秽这一名称才得以延续下来。

(责任编辑 程奇立)